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儒学现代化^{*}

郭 瑞^{**}

【摘 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近现代历史发展中的根本性事件。马克思主义传到中国后与儒学冲击、碰撞、交流，最终实现融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现实需要，也是儒学现代化的内在要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儒学现代化相互联系：儒学为马克思主义提供民族的形式与内容，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儒学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动下实现现代转化。在革命、建设与改革各个阶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不同面相，批判继承是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文化方针，新中国成立后对儒学不断升级的意识形态批判表明党还未能处理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儒学现代化的关系。改革开放之后的一段时间内，受错误思潮影响，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指导地位弱化，儒学现代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渐行渐远。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深度融合，儒学不断实现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儒学现代化进入新境界。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儒学现代化；儒学

儒学与中国传统社会联系密切：文化形态的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制度形态的儒学曾经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官方意识形态，作为生活的儒学，内化为中国人的价值准则、伦理习俗与心理偏好。作为封建意识形态与政治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儒学，其政治功能已经终结，想要回到意识形态独尊的位置已经不可能，但作为文化形态的儒学还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国人并在现实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优秀儒学传统是实现社会有效治理、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藏。近代以来，围绕儒学传承与创新，推动儒学现代化的思考从未停止过。对

^{*} 2019 山东社科规划青年学者重点培养计划研究专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动传统文化现代转化研究”（19CQXJ18）阶段性成果。

^{**} 郭瑞，中共中央党校博士，济宁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文化。

儒学现代化的思考,不能越过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中的根本性事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只有将儒学现代化纳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视野之中,才能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现实需要以及儒学现代化的内在要求,才能对二者关系有更为清晰的理解与认识。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各个阶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着不同的面相,决定了儒学现代化有不同的方向与任务。儒学现代化伴随着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进程,与社会的发展同步,同国家与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在马克思主义不断中国化的进程中,儒学经历了一个被质疑、被否定、被批判但又迎来发展机遇并重新焕发生机的反复过程,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推动下,儒学找到了现代化方向,成功实现现代性转化。

一 思想解放:五四新文化运动对儒学的批判与马克思主义传播

经过新文化运动科学与民主的资产阶级思想启蒙,以及对儒学为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解放了思想,结束了儒学的意识形态独尊地位,解除了儒学与封建专制主义瓜葛,它所开创的思想解放局面为马克思主义正式引入及广泛传播奠定了思想基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促进中国人新觉醒,逐渐改变中国人在思想上的被动局面,直接推动了五四运动的发生以及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一) 五四新文化运动对儒学的批判促进了思想解放

五四新文化对孔子及儒学的批判与当时社会尊孔复辟的环境有直接的关联。辛亥革命之后,整个社会呈现无序和混乱的状态,意识形态更是混乱不堪,尊孔复古的社会意识一度甚嚣尘上,并且尊孔与政治复辟结合在社会形成的逆流,严重背离时代潮流,不断冲击辛亥革命的成果。康有为等人认为政治败坏,缘于道德堕落,而道德的堕落则是由丢弃儒学造成的,如今当务之急就是从恢复儒学道统地位,建立儒教入手,解决社会道德伦理败坏与堕落的问题。“如果说在清末,倡孔教的人是与君主立宪的目标相关联的;那么,在民国初年倡孔教的人就大多数是基于道德救国和宗教救国的愿望了。”^①袁世凯窃取了辛亥革命的成果之后,为谋求当上皇帝,摆出一副尊孔的姿态,企图以儒学为招牌,为其行为提供合法性。袁世凯重弹尊孔的老调,亲自掀起的尊孔崇儒的复古之风,助推了社会上尊孔复古的风气。民国初年出现的尊孔复古逆流,主要是因为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结束了封建帝制,但是它只是赶跑了皇帝,封建专制的文化基础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社会占统治地位的还是以传统儒学为代表的旧文化、旧思想、旧伦理、旧道德,并没有挖掉封建专制主义的老根,特别是在意识形态领域,旧的思想文化不可能随着一场政治风暴而消失。“中国二千余年尊孔之大秘密既揭破无余,然后推论孔子以何因缘被野

^① 耿云志:《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研究导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第191页。

心家所利用，甘作滑稽之傀儡。”^① 自近代以来，无论是改革、改良，还是革命，对以儒学为代表的封建文化都没有根本的触动，没有在思想文化上清除封建残余势力的影响。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根本危害就在于“别尊卑、重阶级，主张人治，反对民权之思想之学说，实为制造专制帝王之根本恶因……不将此根本恶因铲除净尽，责有因必有果，无数废共和复帝制之袁世凯，当然接踵应运而生，毫不足怪”。^② “要巩固共和，非先将国民脑子里所有反对共和的旧思想，一一洗刷干净不可”。^③ 五四新文化运动发动者们认为，必须发动一场批孔的思想解放运动，清除国民脑袋里的“神物人物”，克服“一般国民依赖英雄，蔑却自我之心理”。^④ 从思想文化入手，发动一场文化运动，要努力改变人们的思想，宣扬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反对封建文化，从专制的、宗法的、家族的儒学束缚中解放出来，实现人的觉醒。五四新文化运动对“批孔”对孔子及儒家学说的彻底批判，是一次彻底的文化革命与思想革命，这既是资产阶级思想启蒙的需要，也是当时封建军阀借儒学进行复辟倒退的形势所迫。五四新文化运动对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儒学为代表的封建主义思想和传统观念进行了猛烈的冲击，使这个曾经享有绝对权威的思想开始崩溃，标志着中国人的思想革命与思想解放达到一个新的阶段。如果不反对这些老八股和老教条主义，中国人的思想就不会解放，“中国就不会有自由独立的希望”。^⑤ 新儒家代表人物贺麟认为“五四时代的新文化运动，可以说是促进儒家思想新发展的一个大转机。”新文化运动对孔子及其学说批判的“最大的贡献在于破坏和扫除儒家的僵化部分的躯壳的形式末节，及束缚个性的传统腐化部分”。^⑥ 五四新文化运动对儒学的批判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扫清了障碍，为儒学的现代转化引入先进的思想资源，儒学迎来新的转机。

（二）马克思主义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的传播促进了中国人新觉醒

“自从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⑦ 然而，近代先进中国人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总是以失败而告终。近代以来中国向西方学习不断失败的历史，使得中国先进的人物按照西方资产阶级国家的榜样来改造中国的企图逐渐变成一种不可能实现的梦想。多年失败的教训，加之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矛盾和危机，使得中国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开始对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产生怀疑和失望。他们在号召人们向封建文化思想进行彻底斗争的同时，努力寻找新的出路。20 世纪初资本主义国家的经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五四运动文选》，三联书店，1959，第20页。

② 《陈独秀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3，第194页。

③ 《陈独秀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3，第233页。

④ 《李大钊文集》上册，人民出版社，1984，167页。

⑤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832页。

⑥ 张学智编《贺麟选集》，吉林人民出版社，2010，第131页。

⑦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1469页。

济危机以及随后第一次世界大战,引起中国人极大的震惊,进而对所谓的资本主义文明不断质疑,向西方寻求真理的脚步也逐渐停止了。

五四新文化运动在没有接受十月革命的影响之前,存在一些严重的缺点:在阶级觉悟上,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当时还不懂得,要彻底改变中国的现状,挽救中国的民族危亡,就必须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从根本上改造中国的社会制度。虽然他们在资产阶级思想宣传、反封建启蒙上做了不少工作,但是他们没有把对封建礼教的批判同对统治者的不满和反抗结合起来,缺乏敏锐的政治嗅觉,政治觉悟还不成熟。在势力范围上,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参与者和影响范围主要集中在城市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广大劳动群众还没有参与。在思想指导上,新文化运动文化批判中没有唯物史观的指引,缺失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沿用的是资产阶级形式主义那一套方法,充斥各种形而上学的思想与做法。正如毛泽东指出的那样:“他们反对旧八股、旧教条,主张科学和民主,是很对的。但是他们对于现状,对于历史,对于外国事物,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①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给处在黑暗与迷茫的中华大地带来光明与希望,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经验给探索救亡道路的中国人指明了方向。俄国在十月革命之后的明显变化,对中国的知识分子来说,显得是如此亲切和易于理解,使得他们看到了中国未来的希望,他们便根据这种新的觉悟和认识重新考虑中国的问题。“中国有许多事情和十月革命以前的俄国相同,或者近似。封建主义的压迫,这是相同的。经济和文化落后,这是近似的。两个国家都落后,中国则更落后。”^② 俄国十月革命回答了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问题,消除了他们内心的怀疑和困惑,在近代探寻真理道路上屡屡失败的中国人开始审视并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正如毛泽东指出的那样:“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③ 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从而为中国的民主革命注入了全新的思想因素,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从文化领域扩展到政治领域,从思想文化革命向政治斗争转化,由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畴向无产阶级政治革命转变,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的坚决性和彻底性不断加强。

在十月革命以及世界革命高潮的带动下,五四新文化运动从文化领域扩展到现实斗争之中,从思想文化运动向政治革命转变,范围和深度较之于从前都极大地拓展了。他们开始有目的地介绍苏联革命经验,开始介绍与传播马克思主义。李大钊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宣传的第一人。1916年5月自日本回国以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832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1469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1471页。

后，即参加了陈独秀领导的新文化运动，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1918年先后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1919年9月，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系统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它是第一次比较系统地介绍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也是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最重要文献。五四运动之后，李大钊继续介绍十月革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以及社会主义苏联国内情况，继续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李大钊在《俄罗斯革命之过去和将来》《十月革命与中国人民》等文中，比较详细地介绍了俄国十月革命的历史和革命以后的情况，着重介绍了列宁的生平事略，指明了中国人民要取得彻底的解放，就必须走苏俄的道路。

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在接触马克思主义以后，迅速接受了它并开始尝试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与方法观察，分析与解决中国实际问题。在李大钊的周围聚集了一大批追求进步、向往真理志同道合的同事、学生，形成以北京大学为中心的马克思主义传播中心，推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不断扩大影响力，让更多的积极分子投身到马克思主义传播之中。《新青年》编辑了《马克思主义专号》并开始翻译与出版《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各地共产主义积极分子，如毛泽东在湖南，周恩来在天津，李达、李汉俊在上海，在思想上完成马克思主义的转变，并立即投身于工人阶级与爱国人士之中进行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宣传，有力地推动了全国各地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与启蒙。

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极大地促进了中国人民的新觉醒，中国人在精神上开始由被动变为主动，推动了五四运动的发生与中国共产党的建立。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日益广泛，其影响也逐渐扩大，唤醒了更多人的阶级觉悟，不断加入马克思主义思想阵营与宣传队伍中来。为进一步扩大本阶级的团结与组织，特别是迫切要求成立本阶级利益的、能组织和领导工人斗争的政党组织，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先进知识分子也越来越感觉到建立自己的革命组织的必要了。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国革命面貌焕然一新。

（三）马克思主义为传统文化引入新思想资源，推动儒学向前发展

意识形态的文化是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化而更替。从中国近代文化发展看，儒学作为封建时代文化是旧的意识形态代表，随着封建自然经济瓦解以及专制主义政治制度的解体，儒学失去依托，衰败没落是必然的结果。中国社会不断转型与不断涌进的西方资产阶级学说与思想，加快了儒学的没落。五四新文化运动对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主义专制文化和等级观念进行了猛烈的冲击，使儒学这个曾经享有绝对权威的思想体系开始解体。儒学不再是中国社会意识形态的主流，不再是中国社会秩序的制定所依据的准则，不再是中国当政者心目中治理国家必须遵循的大经与大法。儒学作为一整套的纲常、准则、宗旨，在

中国社会价值取向以及人的思想行为方面不再具有普遍的价值与规范作用，人们不再被强制自幼读经，不再以儒学为主业，以儒家伦理约束自己，孔子之言与儒家学说不再是真理的化身、圣人标准被顶礼膜拜。解除与政治的瓜葛，失去意识形态独尊地位的儒学，要生存就必须适应社会发展，以开放的胸襟吸收外来新文化、新思想实现现代转化。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儒学发展出现两个不同的路径：作为文化保守主义代表的现代新儒家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对儒学的借鉴与吸收。

马克思主义诞生于欧洲工人运动高涨时期，总结了工人运动的经验并批判、改造近代西方的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是吸收了西方文明一切有价值元素的集大成者。十月革命给中国人送来马克思主义为中国文化发展注入了强大的动力，给儒学为主要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引入新的思想资源。马克思主义与儒学为重要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结合，是两种不同经济形态上的文化形态，二者之间的结合不仅是相互融合与相互借鉴的过程，而且还是先进文化改造落后文化，最终产生新文化的过程。在中西文化碰撞的历史背景下，“新的文化形态的建构必将寻求西方文化因子作参照，将西方的先进文化因子与中国文化相结合。”^① 马克思主义对儒学进行批判继承、借鉴吸收，将儒学优秀文化基因融入马克思主义之中，马克思主义顺利实现中国化，是指导中国革命的现实要求；儒学因为马克思主义先进思想的引入，在与马克思主义借鉴与吸收中实现了现代转化，转化为新文化重要组成部分，传统儒学因而获得新生。科学、民主、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诞生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儒学为代表的中国文化的结合成功实现。

马克思主义为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使中国这个古老的东方大国创造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发展奇迹。马克思主义不仅为中国文化发展注入强大动力，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结合的建构原则还确立了中国文化发展的基础与未来走向，推动中国文化不断向前发展。随着新时代中国文化建设实践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必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构中发挥主导作用，推动儒学重新焕发生机，为文化强国建设做出应有的贡献。

二 批判继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动儒学现代转化的路径开辟

儒学是封建农耕时代的文化形态，吸收外来先进文化实现现代转化，既是儒学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外来文化本土化、民族化的需要。马克思主义传到中国以后，与儒学产生交集，二者相互冲击碰撞，最终实现交流与融合，推动马克思主义顺利实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不仅为儒学引入先进思想，也为儒学发展注入强大的动力，成功实现现代化。

^① 赵剑英：《21 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第 65 页。

（一）批判继承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儒学现代化的双向需要

批判继承传统文化是中国文化发展的需要。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积淀中华民族深沉的精神追求，代表中华民族的精神标识，为中华民族提供文化的滋养，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中国自传统向现代转型以来，传统文化也应随中国社会的发展逐步现代化。中国要自立自强，就必须对传统文化进行彻底改造，积极吸纳世界上先进的思想与文化，对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加以改造，在此基础上产生新文化。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革命的历史进程中，以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批判改造传统儒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注意借鉴儒学传统形式，吸收儒学积极合理成分，实现马克思主义与儒学有机融合。^① 对于中国古代历史文化，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武器进行批判改造，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推陈出新，反对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② “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就是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它。公式的马克思主义者，只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开玩笑，在中国革命队伍中是没有他们的位置的。中国文化应有自己的形式，这就是民族形式。”^③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动儒学现代化

儒学随着封建社会的解体，以及新文化运动“批孔”，已经失去了昔日在意识形态上的“独尊”地位。近代中国各种思想、意识流派纷繁复杂，儒学作为非意识形态上的影响，仍然在潜移默化地发挥功效。在中国革命进程中完全丢弃传统文化是不可能的，像毛泽东指出的那样：“对于中国古代文化，同样，既不是一概排斥，也不是盲目搬用，而是批判地接收它，以利于推进中国的新文化。”^④ 必须有一种先进文化起到引领作用，在这种背景下，一种新文化的产生就成为时代的需要，成为迫切的革命需要了。

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产生于欧洲的思想文化传入到中国，就必然会对儒学产生巨大的冲击，二者之间的碰撞与融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题中应有之义。同时，马克思主义要在一个经济基础、文化价值、思维方式等迥异的国度里被广泛接受并发挥效用，也必须与本国的实践、本国历史与文化相结合，实现民族化。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1083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708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707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1083页。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的过程，实际上也是二者相得益彰的过程。”^① 马克思主义对儒学的批判改造是先进文化改造、吸取传统文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吸收儒学优秀成分而实现中国化，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与中国风格。马克思主义必须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所谓的“中国具体实际”，包括当前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现实、中国革命的实践，以及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文化。马克思主义对儒学的批判吸收内含马克思主义对中国文化批判改造与选择吸收的过程。对于中国悠久的历史，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武器进行批判改造，去其糟粕，取其精华，推陈出新，反对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②

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③ 中国共产党应该成为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典范。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按照中国的实际特点应用，它是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突出的任务，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中，以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改造传统文化，借鉴儒学的形式，吸收其中积极与合理成分，促进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实现现代转化，产生新文化。

三 意识形态革命：新中国成立后对儒学 为代表传统文化的重新审视

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对儒学文化批判继承，从中吸收有益的成分，借鉴传统形式赋予全新的内涵，促进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结合，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具有鲜明的中国气派与中国风格。但是，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对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评价越来越趋于负面和严厉，这种认识变化与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在意识形态的思考有关联，毛泽东对文化及文艺格外关注，对意识形态领域斗争格外重视，他多次参与并发动了文化与文艺界的批判，这里既有出于对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客观需要，也有晚年毛泽东在意识形态上继续革命的理论构想。毛泽东认为诸如掩盖在文学艺术、思想观念、电影文艺背后表现的争论是意识形态斗争的一部分，意识形态是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强调作为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他认为“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

① 崔龙水、马振铎主编《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第24~25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708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534页。

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①

四 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代的儒学现代化

1978年“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对破除“左”的束缚、促进人们思想解放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实现了拨乱反正，重新确立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标志着中国社会主义事业进入改革开放伟大时代，中国现代化事业被纳入健康快速发展的轨道。在正确思想路线指引下，马克思主义与改革开放时代中国实际相结合产生新的飞跃，在实践中开创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与制度自信不断加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系列理论成果回答了一系列长期困扰人们的理论与现实问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开创新境界。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大陆“思想—文化”经历这样一个转变：由“文化大革命”反思引发对传统文化的激烈讨论，最后发展到反传统的西化思潮大行其道。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讨论在激进西化思潮影响下，由学术思想领域进入社会与政治领域，将文化、民族的虚无主义的意识推到全社会，进一步引燃了20世纪80年代末知识青年的浮躁——表现在国家现代化道路选择上的迷茫与对民族传统文化沉重的思想负担。一场政治风波之后，中国又一次遭到来自西方的制裁与封锁，整个中国知识界开始由浮躁转入冷静的思索。

站在传统与现代的十字路口，中国人开始进行反思，反思自己文化的“劣根性”，当发现西方的个人主义也是无比丑陋时，于是，复归传统成为时代的呼唤。“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内地的文化发生了深刻的转型。”“一种新保守精神正在崛起”，这种与目前“冷战后”的新的世界格局紧密联系的“文化思潮既包含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文化运转的反思，又有对‘五四’以来激进话语的反思”。^②到了20世纪90年代，文化主题出现了“话语转化”，文化界开始出现一股“国学”旗号下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20世纪90年代兴起了文化保守主义思潮中的“国学热”。近代所指的“国学”是与“西学”相对应，在“西学”参照下相对而言的民族文化的总称。儒学当之无愧是“国学”之中的瑰宝。经过20世纪80年代儒学研究热潮的兴起，20世纪90年代儒学成为时代的“显学”。^③“儒学热”是“国学热”的继续，在某种意义上讲，“国学热”就是“儒学热”。如果说在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儒学及儒学现代化的重心在港台地区及海外，那么改革开放之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663~664页。

② 方克立：《要注意研究90年代出现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高校理论战线》1996年第2期。

③ 儒学研究热潮是“文化大革命”思潮消退后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文化界的一个显著特征，前文已经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分析。

后, 国际的交流加快了学术与思想的碰撞与交融, 大陆儒学研究复苏, 得天独厚的人文地理条件和强大研究队伍显示出强劲势头。在短短十几年之内, 国内儒学研究就呈现遍地开花的趋势, 除高校和科研机构以外, 还有各领域、各种身份学者的涌现, 渐露“一阳来复”(杜维明)的迹象。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 港台现代新儒学对大陆儒学研究的反哺, 推动大陆“儒学热”。在“国学热”的浪潮中, 海外的现代新儒学, 即第三代现代新儒家们, 其中以杜维明、余英时、成中英、陈荣捷为主要代表。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下, 他们有机会到大陆讲学、进行学术交流, 他们现代新儒学的思想和著作对大陆儒学研究产生深远影响。在他们的助推下, 人们逐渐破除在儒学现代价值认识上的“左”的思想束缚, 推动大陆儒学现代化进程。

中国经济实力增长与现代化建设成就得益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21 世纪的中国展现了民族复兴的光辉前景。逐渐小康的人们对社会发展有着更高的期待与要求, 多元利益格局与多元价值并存, 人们精神文化生活更加多样化。文化寻根与文化慰藉伴随着传统文化回归不断升温, 成为 21 世纪中国当代社会思想文化一大特色。同时, 民族复兴与文化复兴紧密相连, 儒学在中国文化中的特色地位, 在某些学者眼中儒学也必将伴随着民族崛起而复兴, “复兴儒学”呼声日渐升高。面对儒学复兴的强劲势头, 海内外学者做出“21 世纪是儒学世纪”“21 世纪儒学必然在全世界复兴”的判断。

“儒学复兴”思潮甚为复杂, 这里面既有意识形态上的“儒学复兴”, 也有学术思想上的“儒学复兴”。“儒学复兴”既有文化保守主义的复兴, 也有自由主义立场的“儒学复兴”。在理论界, 更多大陆马克思主义学者对儒学复兴持谨慎的态度, 坚决捍卫马克思主义真理性与纯洁性, 同各种错误思潮做斗争, 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在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关系研究上取得一系列丰硕成果。

改革开放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与文化建设协调推进。改革开放之后, 邓小平指出: “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国家, 不但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 而且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所谓精神文明, 不但是指教育、科学、文化(这是完全必要的), 而且是指共产主义的思想、理想、信念、道德、纪律。”^①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不断推进, 党的十五大明确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以及文化建设目标: “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为目标, 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 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② 进入 21 世纪以后, 面对日益繁荣的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专门讨论了文化发展问题, 通过党内决议方式总结和概括了党在文化建设的实践和探索, 制定了完整的文化理论, 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

① 《邓小平文选》第 2 卷, 人民出版社, 1994, 第 367 页。

② 《江泽民文选》第 2 卷, 人民出版社, 2006, 第 537 页。

设上的实践与探索是对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动文化现代化道路与经验的继承与发展,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文化自觉,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初步成型。

五 历史性机遇:21 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现代化

儒学曾经在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不会缺席中国现代化,也不会民族复兴大业中作壁上观。儒学对解决中国现实矛盾及人类共同面临的发展问题提供现实启示和重要参考,是新时代治国理政重要的传统资源与思想宝库。新时代、新阶段、新形势下,中国现代化事业与民族复兴伟业呼唤与时俱进的理论指导,需要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大众化与中国化,需要推动儒学等传统文化实现现代转化。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儒学为代表的中国文化深度融合,不仅是 21 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需要,也是儒学现代化必然要求,更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需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①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高度重视传统文化,在不同场合发表了一系列继承与弘扬儒家文化的指示与讲话,具有鲜明价值指向与丰富思想内涵,形成丰富的文化建设思想,进一步充实与丰富了党的文化理论,推动 21 世纪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进入新境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关于儒学,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从国家与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角度高度重视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传承。从儒学传统中吸取治国理政的思想资源与政治智慧,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新一届党中央鲜明的执政特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与协调推进中,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从多层次、多领域,不同程度地对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借鉴与吸收,展现深厚的儒家文化向度。其二,从文化自信角度推进新时代儒学“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习近平指出:对待传统文化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结合新的实践和时代要求进行正确取舍,而不能一股脑儿都拿到今天来照套照用”。^②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者与弘扬者,批判地继承传统文化是中国共产党一贯的文化立场。新时代,努力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是习近平对传统文化发展指出的一条发展之路,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批判继承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与升华。不断促进儒学

^①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3 卷,外文出版社,2020,第 32 页。

^② 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 2565 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4,第 11 页。

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重要举措。习近平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① 传统文化是文化自信的根基，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如果丢掉了，就割断了精神命脉”。^② 中国五千年的传统文化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提供了丰富的资源，要不断“从中华文化宝库中萃取精华、汲取能量”“坚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在继承中转化，在学习中超越”，促进优秀儒家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从而使中国文化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③ 推进儒学创新性发展与创造性转化是新时代儒学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必然要求。

回首中国共产党近百年文化建设之路，总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儒学现代化的关系，具有重要理论意义与现实启示。儒学曾经是中国文化的主干，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据主体位置，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根”与“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儒学现代化经验告诉我们，解决近代以来中国问题靠的是马克思主义而不是儒学，马克思主义的成功经验是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取代儒学成为当代中国主流意识形态是历史和人民的抉择，意识形态的儒学不可能真正复兴。在当代中国，复兴儒学或儒学现代化都应妥善处理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当代儒学发展不可能、也不要试图取代马克思主义的位置。

考察近代以来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关系，我们深刻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新文化建设路径是解决中国近现代文化转型的唯一正确道路，这是我们必须长期坚持的文化建设路径。新时代，儒学要实现“双创”就必须坚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以开放包容的胸怀，积极吸纳世界一切先进文明，积极构建社会主义新儒学。社会主义新儒学是社会主义条件下儒学现代化的新形态，服务于中国现代化事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有机组成，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化源泉。开创21世纪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新境界，努力推动儒学的现代转化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

Modernization of Confucianism in the Process of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GUO rui

Abstract: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is a fundamental event in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history. The impact, collision and communication between Marxism and Confu-

①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2020，第311页。

②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第313页。

③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第349~352页。

Confucianism after it was introduced to China, and the final realization of integration was the realistic need of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as well as the internal requirement of modernization of Confucianism.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and modernization of Confucianism: Confucianism provides the national form and content for Marxism, promotes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and Confucianism realizes 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 under the promotion of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There were different aspects of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in each stage of revolution, construction and reform. The cultural policy of the party in the period of democratic revolution was critical inheritance, after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continuous ideological criticism on Confucianism showed that the party had not been able to deal wit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and modernization of Confucianism. For a period of time after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influenced by the wrong ideological trend, Marxism weakened in the ideological guidance, the modernization of Confucianism and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gradually went far away. In the new era, Marxism and traditional culture are deeply integrated, and Confucianism keeps achieving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In the 21st century, sinicized Marxism and Confucianism have entered a new realm of modernization.

Keywords: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Modernization of Confucianism; Confucianism